

“重建海上丝绸之路史前史： 东亚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景观”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付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 官民伙

海洋环境造就了不同于内陆的社会文化系统，包括海洋文化景观、聚落形态、海洋生活等。近百年来，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揭示了这一地区史前海洋文化的繁荣发展景象，这是一个依靠海洋捕捞、采集狩猎、原始航海等而发展的独特原始海洋生态文化景观。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航海实践不仅产生了东亚早期的文化互动和人群扩散，而且创造了原始海船与航海术的重要基础，这一基础在过去数千年来亚太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态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东亚新石器时代航海史与史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涉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2017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由厦门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与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主办的“重建海上丝绸之路史前史：东亚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景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多所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考古学者及相关领域的多学科专家30余位参加了会议，围绕新

石器时代陆海文化传播与史前航海、新石器时代海洋景观与海洋经济两个子课题，展开深入的探讨，深化“东亚”跨界海洋文化地带考古与史前史的认识。

一、新石器时代沿海的文化变迁、陆海传播 与史前航海

通过东亚沿海、岛屿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内涵的类型学比较与文化传播研究，分析史前人群的海洋扩散与航海史。提交论文涉及华南与东南亚的“新石器化”的模式与途径、华南与东南亚沿海史前遗址的分布、文化内涵与时空类型的比较研究、新石器时代沿海岸或跨越海峡的陆岛间文化传播与人群移动、新石器时代的史前航路及其与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传承关系。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树皮布石拍在东南亚岛屿的海洋扩张》的演讲，通过树皮布石拍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形象地展示了环南海区域原始文化的交流。他认为，树皮布技术和树皮布石拍的传播路线与南岛语族的早期扩张具有密切关系，他将考古

发现与民族志调查的树皮布石拍划分为复合型(Composite)和棍棒型(Club)两类,指出复合型石拍的出现先于棍棒型,环南海区域发现的树皮布石拍在型式上的不同,是树皮布石拍技术发展不同阶段的反映。在华南大陆复合型石拍和棍棒型石拍都有分布,而东南亚半岛与群岛上主要为棍棒型石拍,少见复合型石拍。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流域是研究树皮布文化的关键区域,在咸头岭遗址、后山遗址和宝镜湾遗址都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树皮布石拍,从出土石拍的形态变化序列可以显示出,早在距今6000至5000年前本区的树皮布文化水平已非常高,而同样高级的石拍在东南亚和美洲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故而华南地区很可能是树皮布技术的发源地,这一技术通过南中国海扩散至东南亚岛屿,再传至太平洋,并抵达美洲中部。

越南考古学会阮金容(Nguyen Kim Dung)研究员《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越北沿海文化》一文,通过对越南北部多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进行观察,并与华南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指出考古遗存反映出两地间的文化互动和人群迁徙比较频繁。越南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从和平文化(Hoa Binh Culture)及“后和平时代”的查卑文化(Cai Beo Culture)和多笔文化(Da But Culture)连续发展起来的,主要有下龙文化(Ha Long Culture)与曼薄文化(Man Bac Culture)。两者从华南大陆沿海和台湾岛接受到的一些文化因素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如在岭南地区发现最早的有肩、有段石器,就频繁地出现于下龙文化晚期地层之中,这正是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在下龙文化石器上常见的一种磨制痕迹“下龙痕”在越南其他地区、华南大陆和台湾岛也都有考古发现。以上说明越南东北部沿海地区和华南地区有着持久且稳固的文化互动,才使得两地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上较为接近。到青铜时代的冯原文化(Phung Nguyen Culture)阶段,在长晴遗址发现有玉器加工场,其玉器制作工艺和玉器形制均与台湾岛和华南大陆非常接近,是新石器时代两地文化紧密联系的延续。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李珍研究员以《北部湾沿海的早期海洋经济和适应性文化》为题,综合分析了环北部湾跨国沿海新石器时代早期海洋经济形态的空间关系。他首先整理分析了环北部湾

的广西、广东、海南及北越沿海100多处“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的内涵、年代与分布,认为北部湾沿海的早期海洋经济和适应性文化发生于距今7000至4000年间,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一般为临近海边及海湾旁沙丘地带的山岗上,有的在海潮浸泡的小岛上,还有的在靠近河流入海口的沿岸沙丘台地上或因海退而形成的湖沼盆地。遗址类型有海岸贝丘和沙丘两类,以海岸贝丘为主。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以石器为主。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所占的比重大,器类主要有螻蛄啄、砍斫器、手斧状石器、石锤和网坠等,其中螻蛄啄最具特色。在遗址的生业系统中不存在农业因素,主要依靠采集热带可食性植物和狩猎陆生动物,同时也依赖海洋鱼类和贝类资源。鲤鱼墩遗址出土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该遗址的先民以海生鱼、贝类作为主要食物来源,陆生动物在食谱中只处于辅助地位。从鲤鱼墩、多笔、琼文、文化等遗址发现较多墓葬来看,多为长期面向海洋定居的聚落。总体而言,北部湾沿海早期的海洋经济和文化表现出对海洋资源的依赖,更多的是对海洋的适应而非开发。北部湾沿海的早期海洋文化是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采集狩猎人群向北部湾沿海地区迁徙的结果。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岩先生《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先秦考古所见文化传播与影响途径》一文,梳理了广东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南越国时期不同时间段考古学文化遗存与岭北及东南沿海、海南等地通过海路与陆路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情况。他认为,广东东部沿海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遗址相对集中,因河口、海湾之地理因素,文化传播更多地利用了沿海陆地走廊、岛屿;西部从沿海走廊的遗址分布来看,不仅疏朗,而且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而珠江口地区向西(红河三角洲)的传播更多地依赖了海路,故此在西部沿海走廊少见相关遗存。红河三角洲及越南北部反而可见自岭南传播而来的器物,即红河三角洲及越南北部应当是文化传播的目的地之一。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仲玉先生《从亮岛人遗存看台湾海峡全新世早期的海洋族群》一文,专题讨论了在福建闽江口亮岛的考古发现及其反映的早全新世台湾海峡的人类活动情况。他的团队发现的“一号亮岛人”年代距今约8300年,“二号

亮岛人”年代距今约为7500年。通过对头骨进行DNA测定,结合他在华南所做的民族学和语言学调查,他认为“一号亮岛人”来源于中国西南部,经过长江流域再南下到达福州地区,最后通过海路到达亮岛,闽江流域自称“Kedet”的蛋民群体可能是其后裔。“二号亮岛人”同样也来自西南地区,经过珠江流域到闽南地区的九龙江和晋江流域,再到达亮岛,闽南地区的白水人可能是其后裔。他认为,早期的海洋族群出现在东亚地区部分海岸和岛屿上,他们通过海路进一步扩散到太平洋西岸的广大区域。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郭素秋副研究员以《台湾四、五千年的史前文化样相及周边关系探讨》为题,分析了台湾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内部关系及台海两岸的新石器文化交流情况。通过对陶器器形、纹饰和制法的细致对比,她指出自大坌坑文化以来的台湾新石器文化虽然与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同期文化存在交流,如闽台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器形和纹饰上的诸多相似,但各地自身的文化特色却通常一脉相承。区域文化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周边不同文化进行因素交流,但各种外来因素并没有取代本区既有的陶器、石器基调,如台湾地区自大坌坑文化以来一直到原住民的制陶方法均采用泥片贴塑法和拍垫法,而不见华南大陆后来常用的泥条盘筑法。在距今约4800至4000年前后,可以见到台湾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新出现许多共同的文化因素,包括泥质黑陶、高圈足陶豆、鼎等三足器,且良渚文化晚期的制玉技术(直线切割、穿孔、圆形旋截等技法)应该也为台湾地区的史前人群所吸收,并利用当地玉材进一步发展出特有的玉器形制。在讯塘埔文化阶段,台湾地区有肩、有段石器和方格印纹陶的出现,亦与海峡西岸两广、福建局部地区的情况相似。她特别指出台湾与大陆东南沿海的海路交流,是不同于陆路交流的更为复杂的网络。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付琳《从几何形印纹陶看台海两岸的早期文化交流》一文,则总结了这一中国东南地区原生的文化因素在海峡两岸早期历史中的兴衰与交流。他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几何形印纹陶文化在闽江流域和台湾岛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和阶段划分。在闽江流域的早期文化中,几何形印纹陶的发展脉络可分为萌生与初步发展(距今约4800年或稍早至3500年)、兴盛(距今约3500年至

3000年)、衰落与消亡(距今约3000年至2000年)三大阶段。台湾岛的发展脉络则大致可以公元前后至为界,划分为萌生与初步发展(距今约4500年至2000年)和持续发展(距今约2000年至200年)两大阶段。台海两岸几何形印纹陶流行的时段呈现出明显差别,其原因是在与北方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几何形印纹陶逐渐被原始瓷器、釉陶器和成熟瓷器所替代,闽江流域约在公元前完成了这一更替过程,而台湾早期文化地处孤岛,在距今2000年以来的早期铁器时代几何形印纹陶仍能持续发展。并且这些几何形印纹陶遗存是植根于台湾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受到同期汉人文化因素影响较少。

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助理教授佟珊《林惠祥有段石铎时空“谱系”的新证据》一文,则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林惠祥先生关于有段石铎三型理论的最新考古证据,重新思考、评估林惠祥先生有段石铎类型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在东亚、东南亚史前陆海文化变迁传播史研究上的价值。林惠祥先生通过中国东南及东南亚地区原始型、成熟型和高级型三型有段石铎的时空分布研究,提出有段石铎发生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逐步扩散至台湾、东南亚及太平洋群岛的史前文化陆海传播理论,为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海洋文化传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变迁与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尤塞比奥·迪松(Eusebio Z. Dizon)发表了《菲律宾群岛间的史前移民与文化交流》一文,通过对菲律宾群岛各遗址中发现的石器、陶器、玉饰品以及各类金属工具进行考察,并与周边岛屿和大陆的相关文化遗存进行比较,总结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菲律宾群岛间人群及其物质文化的流动和传播情况。他指出约从距今4500年前开始,已经具备相当航海能力的南岛语族从台湾南部到达菲律宾,从巴坦群岛到卡加延河谷,最后到达吕宋岛。菲律宾群岛的新石器文化与台湾的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在菲律宾发现的玉器、陶器等与台湾所见的非常相似。从距今3500年左右开始,菲律宾群岛与华南大陆、东南亚大陆以及印度尼西亚东部,出现文化互动和人口交流。菲律宾群岛铁器时代遗址和墓葬的大量发现,显示出这一时期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菲律宾群岛

与外部比较密切的经济贸易网络的建立大概是在公元10世纪以后。

日本熊本大学木下尚子(Kinoshita Naoko)教授发表的《日本琉球群岛新石器时代航海中的环境与文化因素》,总结了史前时期影响琉球人进行航海活动的地理因素与文化因素,她认为岛屿间的距离和可视性与文化间的亲疏关系有关,岛屿之间距离较近或者相互可见时,岛民表现出的往来意愿较高,如距离较近的中、北琉球岛之间的文化较为相似,但与距离较远的南琉球岛之间则缺乏联系。不过,距离和可视性虽然是影响岛民航海交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但真正决定是否进行远航的因素是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公元前6000年起,九州与北琉球、中琉球之间的几乎所有的互动都是从北到南的,没有任何相反方向上的文化传播的例子。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在相距大约1000公里的中琉球与北琉球和九州间,出现了长距离的贝壳贸易,持续了超过一千年,直到6世纪前后。主要的贸易内容是中琉球的海螺,作为在北琉球和九州地区宗教性的手镯制品原料。从南琉球人(冲绳群岛)采集贝壳,奄美群岛和中琉球人充当贸易商人,而在北部九州的人则是消费者。虽然台湾和南琉球的西部岛礁可以相互望见,但台湾的考古发现中很少有南琉球的器物,反之亦然。因此,航海活动不一定是相互往来的,也可以是单向片面的;经济因素是导致长距离贸易和相互间航海往来的重要原因;文化因素是航海活动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地理因素。

厦门大学吴春明先生《海上丝绸之路传统格局的史前基础》,从宏观上总结了历史时期以“四洋”航海为基本格局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史前时代的初创。即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四洋”航海实践,奠基于“背倚华夏,面向南岛”的夷、越土著先民七八千年逐岛梯航的史前航海史。其中“北洋”海域以跨越黄海海峡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为核心航路,就是源于胶东半岛新石器文化的海洋扩张,反映了东夷先民数千年的逐岛航海历史,东夷史前文化还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与日本列岛。“东洋”海域的夷洲、琉球、吕宋海路,也是源于东越、南岛先民的史前迁徙,闽、浙沿海岛屿都发现了与距今7000年~4000年间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昙石山文化相关遗存,即为早期陆海交通的证据,史前文化的海洋移动还发生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

东南亚群岛与太平洋群岛间的众多大小海峡之间,并形成了百越-南岛语族海洋文化圈。“南洋”、“西洋”航路,从秦汉时期的“徐闻、合浦南海道”到唐宋时期的“广州通海夷道”,同样源于南越、骆越先民的海洋文化,珠江三角洲沿海的几十处岛礁也发现了史前、上古的岛屿文化遗存,与珠江三角洲腹地距今7000年~4000年之间新石器文化面貌一致,应是沿海人群向海洋移动的遗存。海南环岛也发现距今5000年~2500年的海岸沙丘、贝丘遗址几十处。越南海岸距今6500年~4500年 CaiBeo、Quynh Van 文化,与岭南沿海的咸头岭、后沙湾等遗存,距今4500年~3500年的 Ha Long、BauTro 文化与华南沿海以树皮布石拍、双肩大石铲、带四突纽玉玦和牙璋为特征的龙山时代至夏代前后文化遗存,都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具有鲜明海洋文化倾向的新石器时代东夷、百越先民,在创造了从黄海之滨到南海北岸的海洋文化初期繁荣的同时,相继完成了近岸陆岛穿梭、远海甚至远洋逐岛梯航等史前航海实践,创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史前格局。

二、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景观与海洋经济生活

在史前大陆海岸与海岛生态环境变迁史复原的基础上,部分学者论文聚焦新石器、青铜时代海洋聚落形态、经济生活与海洋活动。提交论文涉及中国东南及东南亚海岸与海岛地带古生态环境复原、新石器时代陆岛沿海遗址的分布与海洋聚落形态变迁、新石器时代海岸与海岛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海洋经济形态等。

新西兰奥特加大学人类学系查尔斯·海厄姆(Charles Higham)教授《新石器时代文化传入东南亚半岛的沿海通道》一文,分析了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东南亚半岛传播的方式。他按照考古年代学和地理位置的顺序,由北向南介绍了文化传播路径上的一系列重要遗址,通过对各遗址中所见陶器、水稻遗存,以及人骨、丧葬习俗、生业形态等方面的研究,确定了一条从长江下游地区到福州盆地、到珠江流域、再到越南以及其他东南亚地区的沿海史前文化传播路径。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和福建闽侯庄边山遗址和昙石山遗址中发现的早期栽培稻和稻田遗迹,是这条路径的起点和关键节点。在水稻种植者从北方南下之前,广西和

东南亚大陆上已经有了本地土著的居住者,水稻种植者到来之后,对当地的人群构成以及文化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州盆地稻作农业发生于 5000 年~3500 年 BP.,越南北部的慢薄遗址(Man Bac Site)年代约为 4000 年 BP.,通过对该遗址出土人骨进行分析,可以区分出外来的水稻种植者和本地的采集狩猎者两种构成,从其陶器风格和丧葬形态上也可以看出来自华南地区的影响。在越南的安山遗址(An Son Site)中也表现出相似的文化内涵,同时发现了明确的水稻遗存。泰国暹罗湾北部的科帕农迪遗址(Khok Phanom Di Site)是一处非常典型的海洋性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2000 至前 1500 年。从对海侵期和海退期两组不同墓葬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区分出水稻种植和采集狩猎两种交替使用的生计模式。对该遗址出土人骨进行测量后发现其形态接近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江苏常熟圩墩遗址,这也为早期的稻作农业人口是从长江下游沿海迁徙到泰国南部以及东南亚大陆提供了重要证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傅稻谦(Dorian Fuller)教授合作的《不爱远航的稻农:近海史前生业经济传统与海洋偏好》一文,通过对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和印度东部马哈纳迪河下游奥里萨邦这两个位处沿海地带的早期稻作农业聚落进行分析,指出上述两个地区的早期稻作聚落位于沿海地带,但不利用海洋资源,更缺乏海洋贸易。稻作人群看重的不是近海的区位因素,而是三角洲地区适合水稻种植的环境因素。通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关考古遗存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早期稻作居民的食物来源除水稻外,以陆生哺乳动物和淡水鱼类为主,在渔猎经济中罕见海产品。印度东部沿海地区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址也都没有表现出对于海洋资源的利用。从稻作农业发展的内因分析,因其单产量高,占地面积相对较少,为了扩大生产,需要增加劳动力的使用。这会扩大劳动人口的内需,而不会因农业的发展将人口推向海外,故而早期的稻作人群不会成为第一批远航者。那么稻作农业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传播的呢?从东北亚和闽台地区的情况观察,早期的稻作农业似乎只是通过既有的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进入到海洋适应性文化之中,并增添为海洋文化的新经济和文化元素。而这种新加入的经济因素,并没有完全改变当地人群的固有海洋生业模式,他们照样靠

获取大量的海洋资源生活,这与典型的稻作农业文化有很大的差别。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系洪晓纯副教授《跨越台湾海峡两岸的新石器化历程:西元前 13000 至前 2000 年》一文,从聚落、器物、古植物与人类遗骸等多元考古证据,重新检视跨越台湾海峡的旧石器到新石器文化的过渡历程,认为台湾海峡两岸新石器化的历程至少可以区分出三个阶段,即(1)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在洞穴或岩阴遗址、利用石器工业的狩猎采集生活;(2)全新世早期到西元前 3000 年前后,出土较多陶器、位于沿海地区的贝丘或沙丘所代表的海洋渔猎采集生活;(3)大约西元前 3000 年之后,有稻作或兼有粟作农业的大型聚落所代表的农业生活。她运用“农业/语言扩散理论”和“二层假说”来解释这一过渡与传播过程。所谓“农业/语言扩散理论”是指史前时代人口的迁移以农业发展为主要动力;“二层假说”主要适用于东南亚地区,其将东南亚史前人群分为至少两层,一层为土著人群,另一层为随农业传播迁移而来的人群。她首先通过梳理植物考古新发现,如菲律宾吕宋岛发现距今约 3000 年前的稻米遗存,福建霞浦屏风和黄瓜山两处遗址发现距今 4000 年左右的小米遗存等,论证稻作和粟作农业在距今 5000 年至 4000 年前从长江流域经华南到东南亚的传播过程,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南岛语族的扩散。通过对东南亚、华南大陆和台湾岛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头骨进行测量,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多数遗址如奇和洞、甌皮岩、亮岛下层等的人种均为澳美人种,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多数遗址如河姆渡、昙石山、亮岛上层等的人种则为蒙古人种。可惜的是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咸头岭文化、壳丘头文化和大垵坑文化中,目前还没有可供测定的头骨遗存,其人种情况尚不可知。但从已知的情况来看,跨越台湾海峡至东南亚地区的新石器化历程是相当复杂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图卡·凯坤(Tuukka Kaikkonen)《台湾海峡谷物传播踪迹的植物考古学考察》一文,梳理了台湾海峡两岸新石器时代以来稻米与小米遗存的发现情况,指出稻米是海峡两岸主要的粮食作物,小米也是台湾原住民族节日特有的食品。这些谷物在福建出现于距今约 5000 年前,而后不久即出现于台湾,他推测这两种

作物的最初驯化应在中国大陆。然而这些谷物在传播至台湾岛后,其在土著群体生计中的重要性如何?其重要性又是如何随着时间推进而出现变化的?有待于台海两岸,尤其是台湾地区栽培谷物的进一步发现与研究。

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巴里·罗莱(Barry Rolett)教授以《台湾海峡新石器时代海洋贸易的比较模式》为题,讨论了新石器时代台湾海峡地区的海洋贸易的宏观模式。他借用法国史学家费迪南德·布罗代尔(Ferdinand Braudel)对16世纪地中海区域海洋贸易研究的两种模式理论,即“随机贸易”和“有消费目的地的海上商业贸易”,考察台海区域史前海洋贸易现象。他观察到本区海上贸易的两个重要现象,其一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在广大东南亚地区均发现有台湾玉器,特别是玉耳饰Lingling-O。其二是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大量在澎湖列岛七美岛制造的玄武岩石器沿海路传播到台湾各处。他认为在南岛语族早期文化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也没有贸易中心,所以不适合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模式去阐释他们的贸易行为。通过对波利尼西亚礼物交换行为的民族学考察,他认为在南岛语族的早期贸易模式研究中可以引入“礼物交换行为”这一概念。礼物交换行为是一种互惠主义,在不以即时经济回报为目的的礼物交换行为当中,强化了双方对彼此的义务,人群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得以维持和稳固。他认为东南亚地区所见台湾玉器的贸易模式更接近于随机贸易和礼节性礼物交换,而台湾所见七美岛石器的贸易模式更接近于有计划目的地的贸易和经济性礼物交换。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靳桂云、陈松涛《海岱地区史前稻作农业产生发展及其向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一文,书面讨论了稻作农业从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及东北亚传播的最新发现与研究。目前海岱地区发现史前时期稻作遗存的遗址30余处,稻作农业发展还存在明显的时间先后,首先出现在苏南、鲁南地区,之后逐步扩展到鲁中和胶东半岛,到龙山文化时期扩散至整个海岱地区,稻作农业扩散是一个由南向北逐渐发展的过程。稻作农业的进一步北传主要指向辽东半岛的传播,而东传则指稻作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最新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至迟在小珠山三期时,辽东半岛即已发展稻作农业。

小珠山遗址和大连王家村遗址分别浮选出属于小珠山三期和五期的炭化稻米遗存,而对郭家村、王家村、文家屯等遗址的植硅体分析中发现丰富的稻类植硅体,包括来自稻壳、茎秆和稻叶等不同部位,证实水稻已为本地种植。这说明在小珠山三期时,稻作农业已由海岱地区向北传播至辽东半岛南部地区。由此辽东半岛稻作农业的年代早于朝鲜半岛的稻作遗存,而稍晚于海岱地区,从时空上均贯穿起稻作农业由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路线,这一路线也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

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赵萃博士《环中国海史前贝丘生业形态研究》一文,对环中国海地区贝丘遗址的生业形态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距今约7000年以前的贝丘遗址大多位于华南地区,以采集渔猎为代表的消耗性经济为主导。距今约7000年以后,贝丘遗址普遍分布于环中国海地区,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的食物生产行为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中国中部沿海为界,北部的贝丘遗址表现出更多生产型经济因素,南部的贝丘遗址则不同程度地保留采集渔猎这类消耗性经济因素。她以驯化动植物的饲养和栽培为标志,将贝丘遗址的生业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渔猎采集、亦渔亦农和农业主导。然而,以农业为主导的贝丘遗址似乎仅有胶东半岛的即墨北阡遗址一处。她还发现环中国海地区的贝丘遗址表现出一定差异,如北方贝丘遗址比南方贝丘遗址表现出更多定居的特征,并且部分贝丘遗址中还出现了社会分层。她认为生产型经济的出现和发展程度,标志着贝丘遗址生业形态的改变。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北方贝丘的持续时间短于南方贝丘,北方贝丘消亡的速度高于南方,这与生产型经济的发展速度成正比。另一方面,社会复杂化程度也对贝丘的消亡产生影响。

南京大学考古系赵东升副教授《浙东沿海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文化景观与海洋经济》一文,分析了浙东沿海新石器时代海洋经济的发展过程,将以宁波为中心的浙东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成长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河姆渡文化一至三期、河姆渡文化四期至良渚文化早期、良渚文化中晚期至钱山漾文化时期,三个阶段所表现出遗址分布的时空变迁与浙东沿海地区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密切相关。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群受到海洋生态变

迁的影响,形成不同的文化面貌。他指出在良渚文化晚期以前,人们更多的是在适应海洋,而非利用海洋,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并不发达。在宁波大榭遗址中成规模的可能与海盐制造相关的遗迹和遗物被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晚期至钱山漾文化时期海盐经济在本区业已出现,这是本区海洋经济的真正肇始,也彻底改变了本地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地质工程学院郑卓教授团队《第四纪晚期中国东南沿海海侵与植被变化、人类活动的关系》一文,通过对地质钻孔样本进行研究,总结了近18000年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海侵活动与植被变化、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该文认为,在广东和福建的各个河口地区均有大量海相沉积发现,可以利用粒度、有孔虫、孢粉、硅藻、地球化学等多种古环境指标重建该地区晚更新世至全新世的古地理、古植被、古气候,并探讨第四纪沉积环境演变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我国东南沿海大量的晚第四纪沉积记录显示该地区广泛拥有两套海相沉积,早期的海侵发生在MIS 5阶段,此时大片陆地被海水淹没,然而该次海侵的时间仍存在争议,另一次海侵发生在全新世(MIS 1),精确测年结合有孔虫、硅藻等指标揭示此次海侵发生在9000年至2100年BP之间。全新世最大海侵发生于9000年至5000年BP之间,7000年BP开始全新世适宜的气候以及海侵带来的丰富的海洋资源使得渔猎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文化在东南沿海地区兴起和发展,东南沿海贝丘遗址广泛分布。孢粉记录显示3000年BP以后该地区人类活动对自然植被的影响才开始显著,揭示早期渔猎文化对植被的影响甚微。全新世晚期(4000年BP以后),珠三角淡水湿地沼泽的大面积发育,说明海水开始后退,适宜水稻种植的湿地沼泽开始形成。此时,许多钻孔显示碳屑含量迅速增加,孢粉组合突变为以先锋植物芒萁属、禾本科、松属等类型为主,揭示了植被受到人类农业刀耕火种的影响而发生显著的变化。2000年BP以后,指示水稻的禾本科花粉明显增加证实陆上三角洲形成以后水稻农业在东南沿海得以广泛发展。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可以对早期文化交流和农业扩散做出新的解读。在文化交流方面,由于岭南地区低山丘陵广布,早期居民要在山峦密林中长距离流动非常困难,而在距今5000年左右海平面上涨使得开辟海上交通成为可能。在农业扩散方面,水稻的禾本科

花粉明显增加证实福州盆地、韩江、珠江、红河、湄公河河口三角洲地区在距今2700年至2000年左右稻作农业快速发展,很可能主要是得益于三角洲出陆的影响。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马婷博士研究小组发表《中国东南全新世气候变迁与农耕发展导致的森林变化与森林火灾》一文,从华南沿海丘陵地带四个地质探孔的孢粉与炭屑记录,分析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气候、植被、火灾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探究稻作农业的发展及其他问题。她发现在全新世早中期,常绿阔叶林的高强度反映出当时人类活动对于植被的破坏程度很低,对应了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经济形态。在全新世晚期,禾本和草本花粉增加,其中包括水稻花粉,指示出较强烈的人类活动和刀耕火种的农业开始发生。从不同钻孔显示的炭屑和孢粉情况分析,在距今约3500年之前,较低的炭屑含量指示出很低的人类活动频率,而较高的炭屑含量开始出现于距今3500年前后,这可能对应本区青铜时代的开始。在距今2000年左右农业在低海拔地区开始广泛发展,在距今1000年左右的唐宋时期,农业活动进一步拓展到高海拔地区。

海上丝绸之路史前史与东亚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景观是环中国海跨界海洋区域史前史研究的新课题,涉及史前史与古代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需要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本次会议积极构建一个开放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与会学者齐聚一堂,分享彼此的研究成果,增进学术交流,有力促进这一重要的跨界海洋文化地带考古与史前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